

· 政府治理丛书 ·

转型中国的 治理与发展

张昕 著

GOVERNMENT

GOVERNANCE SERIE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政府治理丛书 ·

转型中国的 治理与发展

张 昕 著

GOVERNMENT
GOVERNANCE SERIE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中国的治理与发展/张昕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政府治理丛书)
ISBN 978-7-300-07923-3

I. 转…
II. 张…
III. 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研究-中国
IV. 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7300 号

政府治理丛书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转型中国的治理与发展
张 昕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5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治理与发展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前沿课题，受到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特别关注。《转型中国的治理与发展》一书正是这种语境下的产物。依据相关的文献研究，本书首先指出，没有良好而有效的治理，就没有公平而持续的发展。其次，通过制宪民主的价值反思，提出了一种多中心治理的制度框架，其中，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呈现出分工与协作的结构关联性。再次，针对政府再造运动的述评，进一步指出，上述多中心治理的新混合经济体制，既有助于把握物品和服务供求关系的基本模式，又有助于阐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最后，在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张昕，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是：当代政府再造、公共治理创新、公共政策分析、公共部门管理、公共物品实验研究以及新混合经济体制。曾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和政治科学系，并在那里完成了公共政策博士项目的相关课程(1995—2000)。此外，还参加过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系的“可抉择公共服务提供体系”项目研究(1993—1995)，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中心的“比较制度分析与设计”项目研究(1995—1997)。发表在《新华文摘》、《剑桥科学文摘》等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策划人 刘 晶
责任编辑 徐海艳 陈 丹
封面设计 李亚莉
版式设计 王坤杰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前言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回国已经七个春秋了。一个智力平凡的我，笃定要在学术领域有些建树，其中的艰辛和坎坷就可想而知了。清朝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诗句，正好反映出我的求学生涯轨迹：“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加工、修改和扩充而成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与发展不仅是时代赋予的主题，而且也是科学探索的课题。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名副其实的“地球村”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借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话来讲，这既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又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全球化不只是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它更意味着一种结构性的变革。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资源的利用、知识的传播、财富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导致了生态的恶化、疾病的扩散、贫富的分化和安全的缺失。人类社会能否摆脱“利维坦”（巨型政府）的统治，重新思考公民社会的自治与共治，这是治理与发展的新理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奥斯特罗姆夫妇，学习制度分析与设计的方法论。他们博学多闻和诲人不倦的品格端正了我的治学态度和职业选择。尽管放弃了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但专业化的教育训练却奠定了我今天的学术根基。在一定程度上讲，多中心治理与发展的选题就得益于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思想精髓。

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多中心论（polycentricity）的概念来自于迈克尔·波兰尼这位人类自由的捍卫者。针对社会事务的可管理性（相互依存的可治理性），波兰尼精辟地指出，这是一个若干要素排列组合的多中心任务，同时也构成了一



个成本最小化和满足最大化的经济命题。此外，波兰尼进一步指出，多中心的任务只有靠相互调整的体系才能被社会所管理，而多中心任务的社会管理要求一整套自由的制度安排。

然而，波兰尼的观点受到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批判，后者强调指出，多中心秩序不应该被贬斥为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就政治体制而言，他认为分立（自治）而重叠（共治）的联邦（复合）体制，就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体制。此外，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还指出，多中心秩序还是一种公共经济的组织秩序，也就是说，分立而重叠（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值得指出的是，在区分提供与生产的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布卢明顿学派（Bloomington School）强调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体制。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所指出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可以理解为公共性程度从0到100%的一切物品和服务。通过物品和服务的分类，布坎南试图探索（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可抉择供给模式。由此可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在于可抉择供给模式之间的结构关联性。

基于上述思想脉络，本书论证指出，作为一种宪政秩序，多中心秩序表现为一种多元复合的规则体系，也就是一种新混合经济的制度框架；其中，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之间呈现出分工与协作的关联性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结构关联性不仅意味着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也意味着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体制。针对转型中国的经验研究，试图检验这样的实证命题——治理的多中心秩序有助于公平而有效的经济增长。

借本书出版之际，感谢人大出版社的编审刘晶女士，没有她的关心和支持，本书很难如愿以偿地与读者见面。与此同时，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各位教授和老师，是他们的理解和宽容，使我最终完成了学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当然，还要感谢本书的责编，她们出色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最后，我愿意以一句至理名言与同行共勉，并结束本书的前言，“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旧约·传道书》12:12）。

张 昕

于人大静园

2007年元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全球化时代背景.....	2
二、治理与发展的命题	13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26
第二章 多中心治理的理论建构	37
一、从“统治”到“治理”	37
二、制宪民主的价值反思	45
三、多中心治理的制度连续体	53
第三章 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再造	62
一、政府再造运动述评	63
二、政府再造的策略选择	67
三、转型中国的政府再造	72
第四章 中国治理的结构变迁	82
一、转型中的国民经济	83
二、非国有部门的崛起	88
三、政府体制的复合化	98
第五章 新混合经济的制度框架	112
一、物品和服务的类型学.....	112
二、提供与生产的制度安排.....	120



三、新混合经济的治理结构·····	126
第六章 中国经济的治理新格局·····	138
一、制度变迁的产权理论·····	138
二、法人治理的关联性结构·····	146
三、国民经济的治理新格局·····	157
第七章 社会和谐发展的治理因素·····	168
一、公平而有效的发展战略·····	168
二、增长与分配的实证关联性·····	180
三、一种典型相关检验模型·····	189
第八章 结论·····	204
一、治理与发展的关联性·····	205
二、制宪民主的政治经济学·····	207
三、多中心治理的发展新范式·····	209
参考文献·····	212



第一章 导 论

生产力越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和民族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越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市场经济胜出和福利国家改革，似乎在向世界宣告：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唯一的理想模式 (ideal type)，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都不遗余力地推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实际上，这些政策建议是指以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政府福利开支和总体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华盛顿共识”也意味着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然而，“华盛顿共识”却遭到了南北各国的广泛批判。针对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华盛顿共识”忽视了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平均收入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收入的提高。这种渗漏经济学^① (trick-down economics) 的思想遭到强烈的反对，公平与效率不能严格应分开来，正如政治学与经济学不能严格区分开来一样。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理论和证据表明，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助于经济增长，而收入的两极分化则有碍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① 渗漏经济学基于这样的类比：正如山巅之上的流水最终会渗漏到地表层里去一样，最富有的人获得的高额收入最终会扩散到各个收入阶层中去。因此，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会受益。



根据对东亚、东南亚和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批判性地指出，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政府主导型的，这与强调最小化政府职能的“华盛顿共识”形成旗帜鲜明的对比。因此，他倡议超越“把政府看成是问题，而把市场看成是答案”的观点，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市场与政府如何平衡以及如何提高二者的效率。此外，针对不恰当的“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率先提出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①（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后华盛顿共识”强调可持续的、稳定的、公平的和民主的国家发展目标，而制度因素在实现发展目标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当发展中国家思考这些发展目标时，斯蒂格利茨还提醒我们注意不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和不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因此，为了让全球经济变得更加稳定以及国家之间更加公平，良好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是必需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家庭社会经济功能的解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暨公共领域（res publica）逐渐开始萎缩甚至消失，这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和社会网络化的客观现实，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再造运动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在西方福利国家开始寻求既不同于市场自由主义的右派，又不同于国家干预主义的左派的第三条道路的同时，人类社会也在重新审视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分工与协作。这种正在崛起的新混合经济，不仅意味着宪政主义的制度建构，而且意味着良好治理的公共政策。



一、全球化时代背景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与有效治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世界发展进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有助于彼此的相互学习。但不幸的是，这也增加了彼此争战的可能性。如果说在人类历史开始时就

^① 针对“华盛顿共识”使用的有限经济学工具及锁定的狭窄发展目标，斯蒂格利茨呼吁：不应该只追求经济增长，还要追求包括教育和健康在内的生活质量的实质提高；应该追求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应该追求平等的发展，不仅使社会上层能够得到发展的好处，而且使所有其他阶层都能平等地分享繁荣的发展；应该追求民主的发展，公民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



存在一种统一或共同的起源的话,那么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百万年中,人类逐渐分散到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陆地上。随后,冰期的结束、海平面的升高,导致非洲与欧洲分隔开来、美洲与亚洲分隔开来以及大洋洲与亚洲分隔开来。从此,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开始了,一直到郑和、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为止(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

(一) 人类历史的全球观

1500 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500 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1500 年以后,各种族集团之间开始了跨地区的直接交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形成,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全球历史开始崛起。值得指出的是,古今中外的很多学者,更愿意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一个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整体,而不是孤立的民族国家历史的简单累加。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约公元前 350 年—公元前 260 年)所阐明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理念一样,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没有种族、地位、区域等区别;世界上只有一种公民,那就是世界公民;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世界国家。

事实上,“世界主义”思想相继在一些古代文明社会中兴起,这是与当时各文明社会发生的历史统一的运动密不可分的^①(张广勇,1999),如西方的希腊化时代、印度的孔雀王朝时代以及中国的秦汉时代。就中国而言,战国时期,中国人的世界观念非常淡薄,他们不大了解周边的情形,那时只有一个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极”的地域观念。正是经过了秦汉统一国家的历史运动,才促进了世界历史观念的产生。司马迁《史记》的广阔的历史视野,不正是这种历史统一运动的一种反映吗!

公元 4—5 世纪,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影响,那时的历史观念经历了重新塑造。当时兴起的基督教史学思想,打破了从前以地理上的文明地区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致力于建构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建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

^① 在罗马统一地中海的时代,古代欧洲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约公元前 204 年—公元前 122 年)在目睹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之后,写下了一部关于罗马统一的世界历史——《通史》。他前瞻性地指出,历史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通过观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事件,便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正在走向统一的过程。



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性规划之中的世界史。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上，圣奥古斯丁（354年—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一书中阐述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奥古斯丁认为，天地之间具有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之分，这两种城原来是浑然一体的，因为人们有罪，才分为两种不同的城。地上之城的罪恶是由恶魔“撒旦”造成的。地上之城是暂时的、会灭亡的；上帝之城是完美的、永存的。前者是罪恶的，是黑暗的世界；后者是善良的，是光明的世界。因此，世界的历史就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是光明的世界取代黑暗的世界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是重叠的或镶嵌的，通过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恢复与上帝自有的盟约关系（covenanted relationship），从而得以进入上帝之城。

从基督教思想出发而撰写的历史，都是一部普遍的、贯穿人类社会发端始终的世界通史。这样，基督教的启示便赋予我们一种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观念。在上帝的无时和无处不在的永恒视野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世界过去的创造到世界未来的结局（柯林武德，1986）。这种贯通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编纂，竭力超越各国和各民族的界限，试图以基督信仰为基础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也推动了近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和世界史编纂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近代世界主义历史观的先驱，但丁（1265年—1321年）认为，无论文明的目的如何具有多样性，一切文明只具有一个同一的目的，而整个人类文明的普遍一致的目的就是全面和不断地开发人类的智力水平，使人类在一切学科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和有所创新。这种文化活动的延续和创新，不是由生命短暂的个人或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来完成的，它需要依靠所有人类协调的集体力量。因此，要创建人类的整体文化，就需要世界和平；而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政体。

托马斯·霍布斯（1588年—1679年），这位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在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然而，其专著《论公民》（1647年）和《利维坦》^①（1651年）却对近现代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无非就是所有人相互为

^① “利维坦”（Leviathan）是《圣经》中所述及的一种力大无穷的怪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此来比喻一个强大无比的主权国家或君主国家（sovereign state）。



敌的战争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人都享有对万物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由于人类的理性驱使，为了摆脱这种彼此争战的自然状态，人们必须自愿放弃原来享有的一些自然权利，在自然法（natural law）的基础上，通过互相订立社会契约（盟约或协议），来和平地解决彼此之间的权益冲突。

然而，自然法并不足以稳固到保障和平持续的地步，人与人实现和平所要求的不只是一致（agreement），也要求联盟（union）。在一个联盟中，所有人的权利都被转让给一个人（君主）或一个集体（议会），这样，“主权国家”或“文明社会”便形成了。通常，国家的起源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如父权统治和专制统治的国家；另一类是设计的，公民通过自己的决定而强加给自己一个主权者（统治者），因此，又被称为政治的国家。尽管主权者的权力是人们同意授予的，但是被授予权力的主权者却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和不可转让的特权。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1804年），可以说是一位旗帜鲜明的世界主义者。在《从世界主义者角度看世界通史观念》（1784年）一文中，他精辟地指出，人们在社会上互相对抗的秉性乃是自然促使人们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展的手段，即人类具有组成社会和解体社会的双重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历史在这种矛盾冲突中，经历了一个从不文明到文明，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在这里，康德所要说明的是，人类的非社会性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然而，康德的世界主义发展观是辩证的（dialectic），人类的非社会性应该受到自然法的约束。在一个完全受普遍法约束的市民社会中，社会成员产生了最彻底的对抗；而社会又使这种自由具有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以便使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彼此共存，从而使自然赋予人类的全部获得充分实现。总之，康德理想中的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内部是立宪共和政体（constitutional republic），外部是国际永久和平，人人在和平中充分发挥各自才能的理想社会。

不同于康德的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在其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使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历史逐步转变为世界的历史，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也必然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而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当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物质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活动。



世界历史日益发展和深化的趋势，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出现、机器大工业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相伴随的。在消灭了以往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消灭了劳动范围内自然形成的各种关系，使这些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使过去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为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所代替的情况下，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必须依赖于整个世界。因此，每个个人的解放程度与世界历史的转变程度是一致的。

（二）全球通史的阶段论

正是由于欧洲和亚洲地理上的可接近性，才使得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学习成为可能（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就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尽管基因遗传学意义上人类起源于非洲。早期的人类文明如同沙漠中的绿洲，分散在欧亚大陆的几条大河流域。这些河流文明主要包括：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这些文明被四周大片的野蛮地区所包围着，超越野蛮地区而发生的交往不仅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也是相当危险的。

直到公元1世纪，古典文明这种相对独立的多中心格局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①这时，罗马帝国已经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帕提亚帝国伸展到整个中东地区，贵霜帝国征服了印度西北地区，中国汉朝占据了东至太平洋的所有余下的地区。诸地区文明稳步地向外扩展，直至相互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得各地区能够开始相互影响，呈现出一个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还是不同程度地践踏了这些处于欧亚文化核心区的古典文明，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金人的侵略，因此，西方古典文明的旧秩序所遭受破坏的程度，远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要严重得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近乎革命性的毁灭，

^① 关于人类文明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存在两种争论不休的历史观：一种历史观认为，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若干个早期的中心扩散传播的；另一种历史观认为，人类文明是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独立创造的。然而，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所有分支对其环境变化的反应都具有创造力，只是他们所取得成就的性质和程度不同罢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



才使得当时处于欧亚大陆不发达地区的西方，能够有机会摆脱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从而开创出一种更能适应世界变化需求的崭新文明。结果，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1500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意味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的冲突史（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1500 年前后的二百年时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到 1763 年为止，欧洲人获得了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相关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来临。这一时期的经济影响是显著的，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了世界各地。新的全球性经济导致了第一次国际分工的完成——南北美洲、东欧和西伯利亚生产原材料，非洲提供劳动力，亚洲供应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主导这些全球性的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

如果说 1763 年，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不是世界霸主的话，那么 1914 年，欧洲人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霸主。他们还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被等同于野蛮。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很大原因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欧洲带来的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应该指出的是，这些革命并不是平行或独立进行的，而是互相依赖、相互影响的。

19 世纪末，科学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西方所独有的科学与工艺的组合，使得欧洲取得世界霸权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欧洲的艺术、宗教和哲学并没有给非西方民族带来多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在这些领域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然而，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各种奥秘和规律，并为了人类的物质进步对这些知识进行了大规模利用。

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政治革命^①基础之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政治与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开始觉醒起来，不仅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把这种活动看成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值得

^①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着政治革命的开始，随后发生的美国革命（1776 年）和法国革命（1789 年）则意味着政治革命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19 世纪政治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而 20 世纪它又影响了整个世界。